

论现代社会组织兴起的动因

周 健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 现代社会组织广泛兴起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动因,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在经济动因方面,社会组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体系扩展的产物,更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在政治动因方面,社会组织是公民权利扩展的伴生物,是社会权利制约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更是现代国家推进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动因方面,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成员寻求社会认同和满足交往需求的重要方式,更是人们追求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现代社会;社会组织;兴起;动因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4.009

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道普遍的风景。不管是草根性的民间组织,还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合法团体,社会组织已经构成当代公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同样的情形也在中国社会出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组织开始蓬勃兴起,从各种活跃在街头的民间自发性组织,到深入基层社会的社区组织,再到参与政府决策的公益性环保团体,社会组织正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着突出的功能。因此,探讨现代社会的兴起动因,分析其背后的推动机制,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一、经济动因

当代社会组织广泛兴起,其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加,最直接的动因是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动因的角度看,社会的出现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展的产物,更与社会成员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1、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对于社会组织兴起这一现象,必须立足于生

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社作为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活动,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和影响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引起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造成人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方式单一,社会利益分化程度不高,社会生活比较简单,人们的社会交往程度较低、频率较少,结社的愿望不太强烈,最多只有经济上的结合,以及极少部分的社会互助,社会组织的类型较为单一。然而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极大变化,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不断增强,社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社会生活也变得日益多元化,“从而使社会的主体系统在基本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多领域、多层面的连锁分化,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具有各种特殊利益的松散群体”。^[1]多元分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出现,促进了各种建立在特定群体和阶层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出现,并使得社会组织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处于低级阶段时,人们的需要层次不高,结社活动可有可无,而

收稿日期:2017-03-1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SH03)。

作者简介:周 健(1978-),男,江西吉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时,随着新经济组织体系的扩张和利益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变革,从而也要求社团组织快速发展,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P15)}社会组织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增加的现象同样深刻地体现在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上。根据国家民政部门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社会组织66.2万个,而这只是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获得了合法身份的社会组织,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没有进行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社会组织的数量有一个明显的增加趋势。而这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来看,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组织兴起的最为根本的动力。

2、市场经济推动的产物

与前现代社会相比较,推动现代各种社会组织兴起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在前现代社会,市场在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并不扮演重要角色,其对社会成员的生活和行为也不构成重要影响,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依据的是其它规则。如波兰尼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 and 调节的。”^{[3](P38)}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市场体系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体系,市场模式成为支配经济运行的主要模式。波兰尼深刻地指出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3](P50)}社会关系被经济体系所渗透和支配,市场法则构成社会活动的主导性法则,这就必然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体系扩展对社会组织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人员基础。现代社会组织大都是基于人们自愿合作的前提下成立,是社会成员个体意志和自主结社的结果,是人们后天性的社会活动产物,这里存在的一个前提是社会成员要成为独立、自主的原子化个体。市场经济促进了共同体的瓦解,解除了传统社会加诸个体身

上的各种束缚,使社会成员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正是立足于众多独立自主个体的基础上,现代社会组织才能获得充足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源。第二,提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交易规则,依靠“无形的手”来分配社会资源的,资源的占有与使用情况呈现分散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在市场中活跃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体所有者和公司企业,它们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的资源,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市场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不仅被用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流入社会领域和公共空间,用来维系各种社会团体的生存与发展,并服务于特定的需求和目的,从而为现代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提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意识基础。“市场经济越发展,个人与团体的自主意识越强,处理社会交往的能力也越强,这样,社会的自主性品格就逐步确立起来。”^{[4](P189)}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进入市场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竞争,自主地决定生产和交换,自己承担竞争的风险和责任。正是在这种自主选择、自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才能获得培育和成长。这些意识构成现代公共品格的主要内容,是现代社会组织与传统社会组织的重要区别之处,是支撑社会组织运行不可缺少的观念维度,它们是推动社会组织成长的意识基础。

3、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虽是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只是构成宏观性的背景因素,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间接原因。在实际活动中,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才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的直接原因。现代社会人们建立社会组织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也确实成为公民维护利益的重要工具。就这一点来看,不论是传统社会出现的各种血缘性和地缘性的组织,还是现代社会活跃在国际和国内各个领域的商会、行业协会、生产者与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其出现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维护组织成员的切身利益。社会成员通过组织的方式彼此之间交流信息、沟通意见、协调立场,采取一致的行动,不仅可以实现互帮互利互助的效果,而且也能够达到

影响到公共政策的目的。

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合众多分散个体的力量来追求某个目标和维护某种利益,要比单靠个体的力量更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社会成员的理性选择,也是当代世界各种经济类和商业类社会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力的状态。”^[5](P636-637)]阿米·古特曼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没有个人有足够的力量单独行动,追求公共目标的社团就非常重要了。集体的决策未必就一定比个人的决策更有价值,但是,对于实现集体的善而言,社团的工具作用却是根本的。”^[6](P24)]不管这种“集体的善”是否关涉到物质利益,但它无疑表明一点:即相比于个体力量的不足,结成团体以集体的方式追求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社会组织是实现“集体善”的工具。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公共权力的作用领域覆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的巨大权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状况表明,“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都与国家公共权力息息相关,都无法超越国家政治,都要通过国家政治体系来实现和保障,所以,有能力、有条件的利益集团,便会为实现其代表的群体利益而从事政治活动,采用各种方式影响国家权力过程,从而形成压力集团或政治社团”。^[1]这就是当代社会组织广泛兴起,各类社团数量众多的最主要原因。

二、政治动因

现代社会活跃着各种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其背后除了经济动因之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正是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1、公民权利扩展的伴生物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承认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民众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受民众委托,代表民众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这种关于国家和政府来源的理念为现代

社会的出现创设了法理上的空间,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在人民主权原则的支配下,世界各个国家在宪法条文中大都明确肯定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这就使社会组织获得了宪法上的支持,具有了合法开展的法理基础。

实际上,结社成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是近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的事。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后,为了防止专制权力的复辟和限制公权力对有产者的任意侵犯与剥夺,承认公民具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意图通过公民权利的实现来达到限制政府权力任意行使的目的。然而,这只是公民权利扩展的一个方面,权利扩展的另一方面则与无产阶级的抗争存在密切关系。资产阶级掌权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宣扬的各种权利,开展了积极的斗争行为,从而推动了权利的扩展。经过长时期的抗争,权利从有产者的专享之物扩展为全体国民的共享之物。正如马歇尔基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考查,认为公民身份可以分为三个基本要素: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这三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过程:公民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归于20世纪,^[7](P11)]从而使得公民权呈现出一种“浪潮式”的扩展图景。现代社会组织大量兴起正是在公民权利扩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权利话语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论证了结社行为具有宪法上的合宪性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而社会组织反过来又为公民权利的普遍实现提供了斗争的组织形式,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促进了权利范围的增加和权利内涵的不断发展。

2、社会权利制约政治权力的重要形式

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不断集权的过程,中央政府凭借国家名义将散落于传统贵族、教会、采邑、军阀等地方社会力量的权力集中起来,构建起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国家的集权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是现代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强大的公权力在带来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秩序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损害公民的正当利益。托克维尔清楚地看到两者的矛盾关系,他把国家的集权分为“政

府集权”和“行政集权”两个部分,认为一个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的国家不可能生存下去,更谈不上繁荣富强,但是强大的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地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8](P97)}因此,如何制约公权力,使之保持为民服务的本质而不至沦为作恶的工具,就成为现代国家建设必须要考虑的内容,而各种社会组织正是现代社会力图实现以社会权利制约公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重要形式。

从理论上讲,由于结社自由权的确立,人们享有自愿的、不受外在强制干涉建立社会组织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结社自由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权利,是一种消极自由,它构筑了公民自由活动的保护边界,以防止公权力的不当干涉。从现实中看,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社团、协会、利益团体和草根组织构成了社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独立的社团代表着社会多元的利益和价值,它们之间既相互对峙也相互联合,既相互斗争也相互妥协,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各自的发展。由于社会中众多分散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力量不断增加,使得社会获得了与国家对抗的力量,能够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力制约。如约翰·基恩所说的:“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谁提倡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合都将危及民主的革命。没有社会制约的国家权力总是危险的和不可欲的,它是对专制主义的放纵。”^{[9](P124)}

3、国家推进社会治理的需要

在全球化联系不断扩大、社会风险日益积累的状况下,当代国家的治理活动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难题。政府需要满足社会成员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应对各式突发性的情况,需要推进社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然而,单靠国家的力量,用行政手段来达到社会治理的高水平和良好状态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为此,国家需要借助其它力量来分担其承受的巨大压力,共同应对社会的复杂治理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就成为国家和政府值得依赖的重要力量。

正如理论分析所揭示的,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都会出现失灵,都有其所不及的地方,一个有效且稳固的治理模式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形成的稳定结构。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和巨

大影响力,市场依靠其资源和利益激励机制,社会则发挥其志愿精神和自组织能力,三者相互之间紧密合作,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共同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实际上,社会组织在现代国家的治理活动中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可以极大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通过社会的自组织活动,社会组织能够主动协调成员的利益关系,协商解决矛盾纠纷,使得社会问题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就得到有效化解,从而节省政府的治理成本,政府可以从社会治理的直接冲锋陷阵角色,转变为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和服务效果的监督评判者角色,有力地缓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对人们的理性参与意识、合作精神、协商妥协理念的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具有较高素质的现代公民形成和现代公共精神的培养。正是看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优势之处,现代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大多持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立足于基层社区、服务于特定人群与边缘群体、具有较强公益性和较高服务能力社会组织,政府往往在政策、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使得此类社会组织能够实现良性的成长,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功能。

三、社会动因

现代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虽有其经济和政治动因,但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人们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社会组织之中,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社团、协会、俱乐部和志愿团体,从而推动了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成员的参与,社会组织要么得不到建立,要么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因此,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动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现代社会成员重建认同的努力

对于“认同”一词,各人有其不同的理解。其实,认同是指关于自我之思考。换句话说,认同就是问这个问题:我是谁?其意思就是指,我是属于哪一个类,或者是属哪一个共同体?由于每个人对自我归属于哪一个类的理解不同,从而产生出“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在社会生活中,每个成员都会将自己归属于某一个类或群体,

从而形成对所属类别与群体的认同感,以此来保持自身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价值归属。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认同是相对稳定的。弗罗姆认为,传统社会的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有机会从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而在地理位置上,人们也缺乏自由迁徙的权利。每个成员一生下来,便在社会中有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不会置疑的位置,这个位置也就是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这个社会角色几乎不可能改变,更不可能放弃。^{[10](P32)}因此,传统社会的成员终生属于某一个固定的社群,对于个人属于哪一个类别有现成而明确的答案,个人的认同相对明确和稳定,所以很少发生认同危机。

然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共同体不断瓦解,个体本位的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纽带遭到解体,个体化的人需要新的基础上重建新的认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交往网络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提升自己应对社会风险、化解心理危机的能力。对于广大社会成员来说,“传统的社会组织与纽带的解体也使个人失去了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联系的传统纽带。个人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联系来摆脱身份社会解体后,原子化个人孤独无依的局面,从而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1](P100-101)}面对社会转型造成的个人认同的变化与危机,为了重建新的认同机制,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社会成员通过自由和自主结社形成的各类社会组织就成为个体成员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式。通过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现代社会的成员得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得以在现代社会建构起相对稳定的认同感。

2、满足人们社会交往需求的方式

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角度出发,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与他人结合、互助、分享情感的要求,也就是具有社会交往的需求。但是要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靠家庭和国家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现代国家的管辖范围太大,权威过于专断,功能又过于政治化,而家庭的范围又太小,功能较为狭窄,只能满足人们的部分情感需求,两者都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需要。于是,“人类不得不去寻找在家庭和国家之外的适合于开展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组织形态,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

组织’或‘社会团体’”,^[12]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成为横跨在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以便于人们开展社会交往、沟通联络感情、实现互助的重要方式。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农业共同体解体,人们进入了以原子式个体为构成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在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社会既带给人以安全感同时又严格束缚人的机制逐渐瓦解,个人主义文化兴起,个体有了更为自由的竞争空间。然而,现代社会虽然增强了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却给人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物质主义和享乐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人际关系变得功利化和庸俗化,社会日益变得冷漠、自私,社会成员面临着突出的心理危机和情感失落,这使得人们进行社会交往从而获得情感慰藉的愿望更为突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组织满足了人们相互交往的需求,重新给予其成员以归属感、信任感和安全感,成为重建社会成员之间有机联系的纽带和桥梁。通过参加社会组织活动,人们满足了自己的交往需要,并在同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了对社团、社区的归属感,而“对于独立的个人而言,归属需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马斯洛把人类对归属和爱的需要看成是人类的最基本需要,它们在马斯洛的需要等级中处于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的连接处,是一种具有社会倾向的需要”。^[13]这构成现代社会人们以各种组织形式开展交往活动的重要心理诱因。

3、追求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也促进了人们的利益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利益不仅与个体息息相关,而且包括社会和公共的内容。它不仅指涉物质性的一面,而且包括道德性的内容,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成为利益概念的重要部分。当代各种公益类社会组织大量出现的背后,离不开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与实践。

实际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来源于人的本性之中,因为人的本性中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有“利他”的一面,这种“利他”的本性根植于人的更深层次本质。张康之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存在,那就是人的道德

存在。人的道德存在是人的一种更高形式的存在,可以说是人作为人的最为实质性的内容,它的终极形式就是良心。”^{[14](P201)}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欲望,更有伦理道德方面的追求。人们相信自己参加社会组织,并不是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是追求人类最一般和最普遍的伦理价值,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内心深处,人们给这一价值赋予了最高的意义,给予最真诚的关切,同时在行动中付诸艰苦的努力来实行。于是,对公益的追求过程就超出了个人利益的功利计较,升华为信仰层面的内容,从而具有最稳固、最坚定、最持久的特征,并体现为人的终极追

求。一旦个人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当成生命中的最高价值,甚至赋予其以信仰的意义,那么他就不仅会参加公益性组织,并会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现代社会中活跃的各种环保、扶贫、慈善救助、弱势群体关爱、社区服务等组织大都属于公益类社会组织,它们正是来源于人们对公益的追求而成立的。这些社会组织关注的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着力于解决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它们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良好治理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王楷模. 政治社团:生成机理与特征、功能[J]. 政治学研究, 2003, (4).
- [2] 毕监武. 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 [3]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4] 伍俊斌.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 [5]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 董果良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6] 阿米·古特曼. 导言[A]. 阿米·古特曼, 等. 结社:理论与实践[C]. 吴玉章, 毕小青 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6.
- [7] T.H. 马歇尔.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郭忠华, 刘训练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8]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 董果良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9] 约翰·基恩. 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A]. 杰弗里·亚历山大, 邓正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0] 埃里希·弗罗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海 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 [11] 刘培峰. 结社自由及其限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2] 刘作翔. 社会组织的人性基础和存在意义——一个法理的阐释[J]. 法学, 2002, (9).
- [13] 孙宝云. 从群众到公民:不可忽视的社团整合功能[J]. 探索, 2009, (1).
- [14] 张康之. 论伦理精神[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Motivations for the Rise of Modern Social Organizations

ZHOU Ji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modern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a outcome due to the impetus of multiple elements,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motivations. Economically,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the outcome of soci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y are effective means for citizens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 Politically,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by-products of extension of civil rights as well as important means by which social rights may limit the political powers, and they are also necessity by which modern state can promote the virtuous circle of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ly,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vital means by which members of modern society can seek social identity and satisfy their need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y are also importance approaches through which people seek public interests.

Key words: modern society; social organization; rise; motivation

(责任编辑:石劲松)